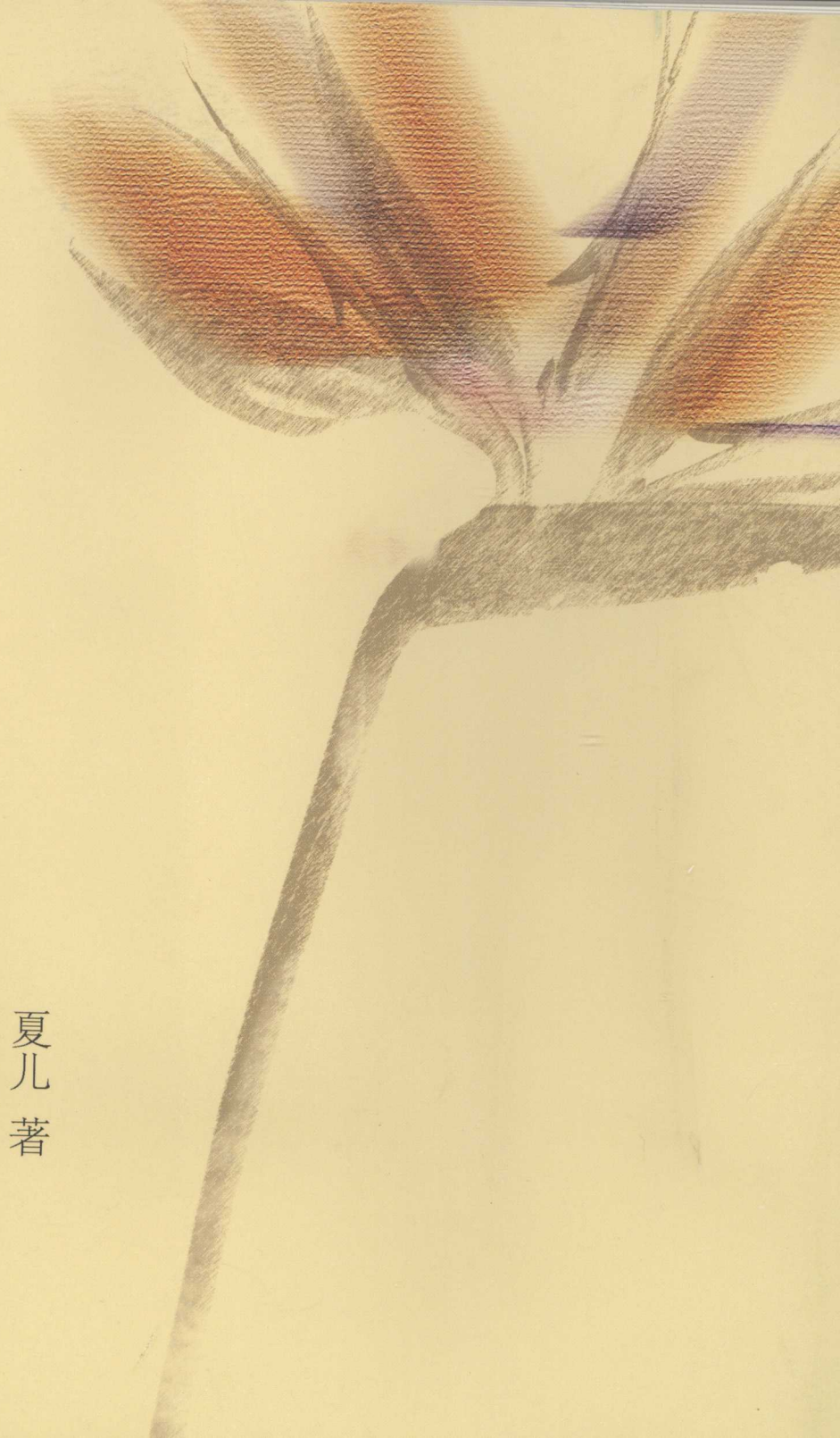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夏儿 著

望鹤兰

望鹤兰

夏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望鹤兰/夏儿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321-3279-9

I. 望…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2874 号

责任编辑: 海力洪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望鹤兰

夏 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279-9/I · 2490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第一部

第一章

1

一九九九年八月底，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华灯初上，树影摇曳，各家装潢名贵的商店的玻璃大门后灯火通明。一阵浓烈的复合香味从一家化妆品店飘散开来，逾叶和我就是从那家商店走出来的。我们身上也有浓浓的香味，逾叶在上百个样品里挑了两三个往自己身上洒，我跟着她洒了两次就不好意思了，我们根本没打算买这些香水。我们正在朝协和广场的方向走去，打算再看一次塞纳河。因为几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了。

逾叶穿一件黑白相间紧身连衣裙，头上扣一顶黑色的太阳帽。从在跳蚤市场花了三法郎买到这顶别致的帽子后，她就再不愿把它从头上拿掉了。动身前男朋友彼得给她剪了个比男人还短的造型，把她气坏了，她骂彼得没安好心，让她无法在巴黎施展美丽，实际上彼得是歪打正着，这短发让他的女友看上去越发迷人了。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滚了翠绿边的白旗袍，是在自由市场画人像时，一个越南女摊贩半送半卖给我的。准备行李时逾叶看到了这白旗袍，建议我带上它。想想吧，她用悲剧般的口吻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灿烂了。

人总害怕含威胁色彩的预言，我被“最后”这两个字镇住了，顺从地把白旗袍放进行李箱。没想到它真的令我在巴黎街上很出风

头。逾叶得意地说：“要是在悉尼，哪里会有人这么欣赏你？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到了陌生的巴黎反而有人注意你？”

我茫然摇头。她又很权威地说：“第一，旗袍的雪白和你脸上的迷惘结合得很妙；第二，巴黎人更重视灵魂，你的特别之处是大大咧咧的澳洲人发现不了的。现在你不后悔来巴黎了吧？”

我柔顺地对我的朋友笑笑，她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她。是她的出现，把我从自己阴沉单调的日子里拽了出来，拉上人生舞台，再给它们打上一片斑斓的幻灯。

有个中国作家说过，巴黎是个梦。那是真的。巴黎是一个当你清醒地睁着眼，却还是觉得在做梦的地方。我们连墓地都去了，事实上那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因为在那，最伟大的名字也谦让地只占着自己那一小块地盘，互不干扰地与其他同样伟大的名字和睦相处。巴黎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宏伟古建筑，而在于它潜匿的分量。走在街头，你会感到这城市被一股暗流支配着。那是巴黎的汁液，它在每一块石板下流着，在河里流着，在建筑物之间流着，强行渗透到人体，人们只好对它诚惶诚恐，顶礼膜拜。

今天我们是来对塞纳河做告别的。不过，我已在为下一个目的地兴奋不已，对逾叶说：“真不能想象，再过几天我们就走在我故乡的小路上了！一想到你将要看到我画过的那些就激动。你相信吗，没有一个地方的山，那样美丽而荒凉，让人惆怅，即使在欧洲也没有！”

逾叶沉默一下，像要说什么又止住了。我们穿过杜依勒公园，一直走到临河的大街，上了大桥，靠在栏杆边上，两人一同望着夜色中流淌的塞纳河。河水的凉意从漆黑里漫上来，像在竭力挽留这两个

要离去的中国人。我说：“我们住的悉尼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大河，应该开挖一条人工河流横穿悉尼，这样城市的氛围一定会大大改变，悉尼会更有灵气，你说呢？”

逾叶似乎没有兴趣加入我改造地理的宏伟计划，她被什么困扰着，犹豫了好一会才说：“晓曼，想跟你说一件事，嗯，怎么说呢？我太爱巴黎了，我离不开它，不想走了。”

我呆了好一会才明白了她的意思：“你……不是说好一起游历我故乡吗？”

“以前确实很想去看的。但现在，除了巴黎，再也没有让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了。”

她这么轻易就把我期待那么久的计划全盘推翻了！我一声不响，在黑暗里咬着唇，控制住阵阵失望。逾叶没有觉察我的难受，继续说：“你要理解我。在巴黎我有灵感，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多么重要？你要不高兴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反正我是不走的了。”

远处夜空泛出一片红光，滚滚浓烟在远处涌动，接着传来警车的呼啸，一辆，又是一辆，救火车也开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已吸入远处令人窒息的翻滚浓烟，声音微弱地问：“你留下，我可怎么办呀？”

“你可以和我一道留下来啊！”

“那怎么行？妹妹已请了假，正等着我们……”我嗫嚅着，她火了，大声说：“哪一样更重要？艺术的灵感，还是随时可以安排的与别人的约会旅游？难道你连这也分不清？你一辈子能来巴黎几回？”我争辩道：“我妹妹不是别人。她会很失望的。”

“那没有办法，你只好自己先走了。”她口气坚定。我沉默了。不安在泛起，变成某种恐惧。两个月以来我一直躲避着的问题终于摆

到了面前,那就是,要是现在和逾叶分道扬镳,就意味着我有可能再看不到老蒙的信了。

通信是老蒙开的头,他写了第一封,在我们起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晚上交给了我们。此后每一封从南太平洋那边飞过来的信,抬头都写着我和逾叶两人的名字。这些信成了我被巴黎迷惑的因素之一。其实我并未弄懂,这些信到底写给逾叶还是写给我的。

我的糊涂是与生俱来的,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出错;聚会时间弄错,写信地址拼错,朋友名字记错。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丢掉,包括手表,帽子,衣服,钱包。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我就把一个小行李箱丢在机场,幸亏有机场人员帮我把箱子保管起来了……我习惯了糊涂的日子每天流淌着,习惯了混沌的诗意所带给我的白日梦。但现在情况急转直下,如果我和逾叶不在一块,老蒙就不可能继续做这种含混不清的事,他必须在我们之间选择一个。

他会选谁呢?

2

又梦见白头了。梦里他沉默不语,像从前一样。近年这位高中男同学入我梦里的次数如此频繁,简直成了一个熟悉的朋友。实际上,这辈子我还没有和他讲过一句话。

念高一那年开学第一天,我去得很早,坐在靠窗口一张桌子旁,在暗自庆幸自己能念上高中。我的名字是入学榜上最后一个,学校显然是最后才考虑录取我的。旁边好像有双眼睛,这令我略为不安,突然转过头,一位高个子少年站在窗外。少年有一头奇怪的灰发,仔細看,原来是黑发中夹杂了不少白发。灰发少年用严肃、专注、好奇

又有点阴沉的目光打量我，可能他在想着什么，被我发觉后未能马上回过神来，就这么和我对视了两秒，才蓦地转身离去。

那少年就是白头，班上的男生都这么叫他，我们女生在背后也偷偷这么叫。接下的日子，我偶然瞥见白头，惊讶地发觉他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观察我，眼睛里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沉着，有威胁力。不能复述二十几年前一个男孩的注视到底唤起过我什么样的具体感觉，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一个永远兑现不了的梦。那目光使我一下长大了几岁。我懂害羞了。

白头虽年纪不大，却已有了男子的威仪。他沉默寡言，是个难于接近的男孩，但他一说话，声音却沉稳而清晰可辨，我对他不知怎的有种惧怕。那时除了有事，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谈话的，而且我很害羞，白头也腼腆，我们就更不会互相说话了。不但不说话，还故意躲着对方。少年人是不懂时光紧迫的，我倒喜欢上了这种不用表达，却心里跃动的感觉。这混杂着害怕的神秘的欢乐，成为我高中时代重要的一章。在白头忽然离开学校前，我们间这种以眼睛传递的交流没有中断过。

回望雾一般的人生，白头站在窗外看我的眼神，像雾里的一束光亮，照进那些怅然，惶悚的青春日子。他始终没有主动对我说过一句话。所以他的存在是以他的声音和注视维持在我记忆中的……许多年过去，人生已走完一半，我已把白头忘得差不多了。他的脸，也开始模模糊糊想不起是什么模样了，这时，他却开始来到我梦里。

也许，那时我们相互对望太多，其含义已远胜于任何具体交往。现在我明白了目光也是一种物质。我与白头其实有过真实的接触，因为我们的对望是有质量的对望，是刻蚀心魂的对望。有质量的故事在人生中很少，何况它发生在朦胧的青春岁月。而女人就是为这

些遥远,沉睡的故事活着的。

八年前我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坐上出租车,穿过这个当时在我眼里如天堂一般的城市,在佐治大街找到了中介机构为我预定的留学生旅店。店主夫妇好像是马来西亚人,对我们这些大陆客是一脸不屑,租给我们的房间是八十澳币一周,这个数目让我心惊胆战,因为我身上一共只有八百澳币。女房东是个干巴巴的小妇人,她把我带到房里,重申了各种住房规则,又很快地解释,水龙头的热水冷水都可以直接喝。我有点不放心,问她这自来水真的能喝?她的不屑变成了愤怒:谁说这水不可以喝?——我们天天都喝的!她说完用力拧开水龙头,盛出一些冷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她令我狼狈,仿佛做了很不光彩的事似的。

我放好自己的东西就来到饭厅,急于和别人分享刚到异国的兴奋。可到了饭厅,我的兴奋打了折扣,几个中国男人忧心忡忡地坐在一张灰色大桌子旁。我问他们学校离这儿有多远?怎么坐车?在哪里买生活用品?他们阴沉着脸支支吾吾,没一个人有心情回答我。再转到厨房,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有那么多人!洗碗的,炒菜的,做饭的,听不到说笑声,人人都在快手快脚地做自己的事。

“你是刚来的吧?”有人在我身边说。

我回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左手拿着一锅烧好的汤面,右手拿着筷子,看样子他是准备直接从锅里吃这顿晚饭了。我马上笑容可掬地点头说:“是的是的,我刚到,请问您也是来留学的?”他告诉我他是移民来的,由亲戚担保,可是下了飞机连个亲戚的影子也没见到,他就只好先住到这儿来了。他自我介绍他姓顾,杭州人,以教钢琴谋生……我马上称他顾老师。顾老师知道我还没有吃饭,忙拿来另一

个碗，用筷子把面挑一半到碗里递给我说，吃吧，我煮得太多。别乱花钱，要交钱的地方太多了。这是我到悉尼后的第一顿饭。顾老师边吃面边说，这儿租金太贵，过几天他也要搬走，和另外七个人在小镇合租一套房子。他告诉我，这里所有人都挺难的，要交房租，要交学费，打工时间是有限制的。“我虽然是移民，但只带了一点借来的钱，马上要花光了，下一步怎么走心里也没底，必须马上找到工作，我可是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我听得心都寒了：“找工那样难吗，顾老师？”

“难呀！不过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那个广东人昨天找到一份清洁工。他沿路问人，问到北悉尼一间清洁公司，那里的小工头也是广东人，挺喜欢他的，马上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还让他过一段时间再介绍几个人过去——我们现在就指望他了！”他又把面条扒到嘴里，吃得好响。我羡慕地看着他，恨不得也能跟他那个幸运的朋友一道去当清洁工。顾老师像明白我的想法，打量一下我，说：“你太瘦弱，这工作做不来的。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画画的。”

“画画的？”他放下筷子，“你会画人像吗？”

“会呀。”

“画得快吗？”

“还可以吧。”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你就用不着发愁了。你可以马上试试，去悉尼歌剧院那里给游客画像。听说那儿有不少画像的摊子，生意很不错呢。听说每天都能挣一两百以上！”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有信心了。到了歌剧院却大失所望。哪有什么画肖像的摊子？只有一两个背着画夹子的人在僻静处候着，时不

时瞄一瞄四周，又换个地方，像在打游击。我鼓起勇气，上去问他们生意怎么样。一个说，好日子已过去了！现在歌剧院前不准设摊画像，警察赶人。原来在这里设摊的画家们都转移了，分布到悉尼各处的集镇市场去了，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听他这么一讲我连好好欣赏一下歌剧院的心情都没有了，又赶往别的地方寻找生路去了。两天后顾老师就搬走了。他给我留了他新住址的电话，可是我忙着画像挣钱，等到想起给他打个电话时，他又搬家了。他是一个大好人，但我们失去了联系。

3

自小我就有一种妄自尊大，它秘密地混杂在我的谦卑之中。我总是毫无依据地认定自己会成为一个大艺术家，这个错误的认知严重影响了我的命运。我原是个订了婚的人，但还没成婚就被未婚夫“休”掉了。因为未来的婆婆每次来察看新房都发现里面到处散落着素描稿本、画笔，而且颜料把墙壁和房子各处点缀得色彩斑斓。后来，未婚夫终于听取母亲的忠告，提出解除婚约。

留学到悉尼，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拿到了居留权后，我去了布里斯本，听说那里更容易靠画人像维生。在布里斯本我并没赚到什么钱，倒是遇到一个很欣赏我画作的男人，他说从未遇到过像我这样奇怪的女人。他说他像疯了似的爱着我。他带我去各个区看房子，说想买一间后院带车房的 house，为我建造一个画室。他说将一直支持我的绘画生涯，直到我成功。

房子未买成，他要先回国做一笔生意，挣一笔钱。他要我一再保证等他回来。因为他手头紧，我就给他买了机票，一直目送他过了海

关。他回国后杳无音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沉默地忍受被抛弃的痛苦，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渐渐发觉自己的精神有混乱的迹象：有时我不能明白许多简单事物的含意，像有一层看不见的屏障在逐渐把我和世界隔开，比如路边理发店门口转动的广告，火车上立着的铁把手等等，它们有什么用？耳朵里老是有声响，连路灯光也扰乱我。走在街上，太阳穴会突突跳。只有一个意识是清楚的，那就是我正像一个溺水者，渐渐沉入一个空虚无序的世界。我明白这是危险的，决定趁意识还清醒时把一切告诉远在香港的妹妹。

晓青接电话时正在给孩子们洗头，我支支吾吾只说心情不好，她不明白我想暗示什么，只好一再说，姐，坚强点。孩子们在喊她，她问我到底有什么事，我咬咬牙，终于说出来了：“万一我有事，我的意思是……要是我疯了，晓青，我就在这儿和你告别了，你替我照顾好妈妈。”

电话那边妹妹沉默了很久。忽然说：“这样，晓曼，你马上来香港！你听好了：马上去订一张机票，这你做得到的吗？有买机票的钱吗？要我为你订票吗？”

“我试一试，万一来不及，我们就在这儿告别了。晓青，我觉着自己不大行了，脑子好像每分钟都要失控……真想再见到你和妈。”

妹妹在电话那头哭泣起来。

终于坐在飞机上了，去见我的亲人，在那里我也许还有希望获救，恢复自己的理性。窗外的白云蓝天在我眼中显得呆滞，我木然看着移动的飞机把机场上一一些静止的建筑很快地抛在后面，然后把整个布里斯本抛在后面。座位旁是个英国人，一上飞机他就热心地帮助我把旅行包举上壁仓安放好，他几次试图和我谈点什么，都因我

的无反应而知趣地止住了。吃饭时,空中小姐问我要牛肉豆子饭还是炸鱼,还是咖喱鸡?我茫然地看着她,反应不过来,不知该如何回答。好心的英国人帮了我忙,建议我要牛肉饭,又为我要了橙汁。

深夜,乘客们一个个东歪西倒地入睡了,英国人也披了毯子,斜靠在座位上打瞌睡。头脑里各种混乱想法使我越发担心自己,我坚守着,害怕睡过去后,醒来的那个女人就再不是自己了……我被机身猛烈的震荡弄醒,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说我们正降落香港,却遇到雷暴雨。一道张牙舞爪的闪电划过舷窗,照亮了外面翻滚的云层,暴雨瀑布般倾泻,霹雳像一只怪兽,一次次撕开离我们只有几十米的滚动的乌云,后面是深不可测的漆黑天空。我们的飞机左右摇晃,无助地穿行在这可怕的自然威力的中心带。这时不少乘客也惊醒了,担心地看着窗外。我起初也和大家一样害怕,但另一个想法从容出现了,害怕什么呢?——飞机掉下去,不就一切苦恼都没有了吗?这世上有什么值得你这么贪恋呢?这么一想又不怕了,甚至希望雷电来得更猛烈。我急切地注视窗外。

一只手轻轻落在我肩上:“别担心,亲爱的——不会有事的。”

我浑身一震,原来是英国人,他也在注视着舷窗外,他以为我在害怕。但这一惊却使我从浑噩里清醒过来,忽然又觉得自己能正常地感受一切了。并没有不活下去的理由。英国人镇定地向我解释在黑夜中飞行时,飞机左翼上闪红灯,右面闪蓝灯,这样别的飞机就能判断我们的航向。他安详的声音舒缓了我的神经。是呀,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亲人在机场等着我,故乡也在盼着我回去。我不会,也不应该失去理性。

机身抖了一下,飞机在雷电交加中安全着陆,乘客们松了一口气,掌声响起,赞扬机师技术高明。

在故乡疗养了一段时间，我的状态获得改善后，就回到了悉尼。

还是靠每星期去市场绘画维持生计。虽然精神比从前稳定了，但同样的孤单同样的迷茫还是时时袭来，而且这孤单和迷茫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出国快九年了，我没有停止画画，但艺术实际上已不能坚固地支撑我的人生了。我一定在等待着什么出现。不然，我怎么会这样有耐性，独自在国外度过那样漫长的时光？

4

那天逾叶一进我家门，就有股蓬蓬勃勃的生气随她卷了进来。

一位叫莫凡的女作家偶然路过我家，看我活得那样寒酸却仍埋头画画，觉得像个神话，把这事告诉了她的朋友逾叶，没想到逾叶一听就很好奇，要过来看我。立刻就去，马上去！她是这么说的。她们还找到另一个朋友，一位画廊女老板一起过来看我的画。画廊女老板对我的画不感兴趣，连意见都懒得提。很失望，我又把准备参加国家肖像比赛的自画像端出来让她们看。逾叶是看得最认真的一个。她盯着画面看了好久才说：

“这是画你自己吧？你的脸是这幅画的中心，你应该让它往前站出来，让它说话，而不是现在这样隐没到背景里去。”口气里有一种不容否定的权威。我很想跟这个有意思的女人再谈一会儿，可另外两个来访者已不耐烦了，急着要去吃饭。我送她们下楼时她们已经把我遗忘在一边了，七嘴八舌商量到底是吃北京烤鸭还是吃海鲜？

显然我笨拙的社交能力已经使逾叶的好奇心消散了，而她这个人却留在我印象中。我记得她告诉莫凡她刚完成一篇新的文章，前

几天交给了本地中文周报《东华时报》。第二天我上亚洲店买了这份报纸，找到了到逾叶的文章，是关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

十五年前，因为《情人》，我认识了她。这是第一次。惊天动地。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里，酷热令人害怕的夏天。屋子没有天花板，可以看见褐色的瓦片，阳光就从那儿，无孔不入的倾泻。我从来就不喜欢阳光，从来。我以为是因为它，才令我有疯狂的血液，才因了这疯狂令我的父亲无法对我满意。而让父亲爱我，是我一生中藏得最深的因而也就是最持久的欲望。我在那间小屋里读完了《情人》，不，还没有读完，才读了第一页，我的呼吸就停止了。我应该这样说，所有的事情，连我对父亲的爱都停止了。连对我那新婚的丈夫的爱也停止了。

这真是令我震惊的文字，没有一个中国女人会这样写。

我盼望再次见她。可主动打电话，我没这勇气，每次拿起话筒和别人对话，我第一个本能就是尽快放下它，也许这就是我朋友少的原因。再次遇到逾叶是在一个画展开幕式上。

那是悉尼最具权威的现代画廊，画家是个北京人，他用平朴而带象征性的符号引导画面，用一种独有的中国式幽默加上哲学思考，表达一些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他的成功是非凡的，西方美术评论界为他着迷，把他推为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巨匠，多个西方国家相继邀请他前去开画展。画家脸上带着东方人的睿智和从容，一身朴素的黑色唐装，站在洋人中间很显眼。画廊面积很大，院子里摆着石雕。澳洲人跟中国人混在一起，都穿得挺隆重的，黑压压一片，人人手里拿着一杯酒。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我却一眼就看见了逾叶，她穿一件